

# 读懂中国的“第三领域”

## ——读黄宗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 中国历史回顾与前瞻》

郑济洲 崔 翼

《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中国历史回顾与前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是黄宗智教授最新的著作，其所蕴含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框架为我们正确理解中国的历史、现实与未来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在中国的政经体系与文化传统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非西方式的从属或者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证二元互动合一关系，这种独特的关系类型对中国的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黄宗智教授以“探寻真实的中国”为己任，运用经验归纳、理论演绎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摒弃了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西方思维模式，提出了一种既符合中国实际又具有远瞻性愿景的学术新范式。

### 一、走出“以西释中”：在中西之辨中“定位中国”

近代以来，“以中释中”“以西释中”“以马释中”等解释范式层出不穷，但最容易受到关注且经常被使用的是海外中国学的“以西释中”范式。黄宗智系统梳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海外“中国学”的学术成果特别是连续三代的“美国中国学”，认为他们总是在中西二元对立的框架下来理解中国和西方，而没有“从中国和西方必定相互

---

作者简介：郑济洲，哲学博士，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副教授；崔翼，福建师范大学与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政德建设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21CDJ004）。

渗透”<sup>①</sup>的实际出发。现代“中国学”研究必须扬弃非此即彼的演绎逻辑，以综合平衡的思维推进总体中国的研究。

在中西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框架内的海外中国学思想家，要么执“西方中心主义”一端，要么执“中国中心主义”一端。持“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的研究者往往将欧美特殊的现代化特征设定为其他非西方世界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普遍历史目的”。比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认为，由具有不完全理性的个体自愿、自发合作所形成的自由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佳手段，而科学主义试图利用人类的理性来彻底消除现代社会的高度不确定性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自负与僭妄；<sup>②</sup>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将西方文明看作“绝对精神”在世俗世界演化的最终环节，认为中国、印度等亚洲文明仅是“政治原则的开端，只有在欧洲这些原则才会得到发扬光大”。<sup>③</sup>保罗·柯文转换了这种以西为师、以西为法的视角，强调要“把中国的历史中心放在中国”；<sup>④</sup>以彭慕兰、李中清和李伯重为代表的“加州学派”进一步增强了柯文“中国中心主义”的论点，他们分别从市场发展程度、人地关系、私有产权、资源禀赋、出生死亡率等方面对中国的长三角地区与欧洲的英格兰地区进行横向对比，认为在18世纪，二者的发展程度并无显著差异，直到19世纪初期，“一个影响深远的极重要分流时刻”才真正到来。<sup>⑤</sup>

无论是“西方中心主义”还是“中国中心主义”，都是从主客二分、自我与他者对峙的视野来看待发展中的中国与西方，而在这一过程中真实的中国问题被海外中国学家所忽视。现代中国的发展不能置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等二元对立的思想框架下来理解，而应该跳出“西方中心主义”与“中国中心主义”的窠臼，以中国实际定义中国问题，推动“中国学回到中国”，从“中国与西方传统、革命与改革传统、经典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传统”悖论性共存的真实背景出发来分析中国问题、解决中国矛盾、建构中国理论。这并非意味放弃与西方进行对话与交流，而是强调中国不再是西方理论和视角下的“他者”，它将以中西对话、古今参照的姿态出现在世界多元文化的舞台。回望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中国的成功经验对全世界非常重要，<sup>⑥</sup>我们有必要系统总结中国真实的发展经验，对长期以来占

① 黄宗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中国历史回顾与前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59页。为行文方便，下引该书时，仅在正文中标示页码。

②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7—98页。

③ 韩震：《西方历史哲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5页。

④ 保罗·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70页。

⑤ 彭慕兰：《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黄中宪译，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年版，第322页。

⑥ 罗纳德·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徐尧等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263—264页。

据主流地位的海外“中国学”的错误观点进行正本清源，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中国主体性，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益的洞见。

## 二、超越“二元对立”：“第三领域”传统在中国的新发展

在中国的历史演进与现实的治理实践中，存在着既不能被强制性的“国家权力”完全控制，又不能由具有自治属性的“市民社会”全部支配的“悖论统一”体系，深刻理解这一体系所内蕴的国家与社会二元互动合一的关系是“读懂中国”的关键所在。黄宗智将“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合一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中间领域”，（第195页）提炼为价值相对中立的“第三领域”。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官方及民间皆参与的社会空间”，<sup>①</sup>而在近代西方“国家—社会”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潜移默化影响下，目前关于“公共领域”的分析中隐约透露着遮蔽与掩盖中国实际的社会经济结构的错误倾向。因此，黄宗智认为有必要“建构一个比西方主流理论更符合中国实际/实践的理论概括——重点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目的是要更精准地认识中国古代、现代和当代的国家—社会关系”。（第194页）

黄宗智在1993年首次提出“第三领域”这一范畴，一方面旨在深化哈贝马斯在论及“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时候所坚持的“应当从居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区域”，（第342页）来考察二者之间变动着的关系的认知方法论，另一方面通过使用一种全新的理论表达来诠释“从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这一互动过程中”<sup>②</sup>产生出的“中间领域”，来回应玛丽·兰金关于“在什么范围内，‘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才能都适用于中国的历史”<sup>③</sup>的问题，清晰地界分出既不同于“国家”又有别于“社会”的“过渡地带”。“第三领域”这个概念并非基于“从一个主导概念出发，堆积一些‘经验证据’，甚至滥用或干脆杜撰虚伪的经验证据，来支撑其前提概念”（第1页）的学术研究进路而提出，而是在贯彻“实践社会科学”的价值理念基础上，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研究方法，综合现存的晚清与民国时期的珍稀诉讼案件档案、“日本‘满铁’研究部门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期的‘经济与社会人类学’调查”（第196页）等真实的经验证据，以及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90年代初期在中国农村基层获得的第一手实地调查资料，并对中西思想体系中符合这些经验证据的理论加以借用、重组与改造而形成的研究成果。

介于国家正式体系与社会/地方非正式体系之间的“第三领域”，历史地形成了“具有一定‘特色’的中国传统——一个来自中央集权大国和基层小农社会相结合所形成

①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时期的慈善组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4页。

② 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

③ 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96—197页。

的政法和政经体系传统”。(第227页)这一悠久的历史传统并未在西方现代化的冲击下式微,而是在近现代的社会整合与国家政权建设的双向互动中孕育出了新的“第三领域”组织样态、权力结构与运行机制。位于国家和社会两端之间的半正式化领域“之所以能够连续存在,必定存在着某种稳定发生作用条件的客观动力使之欲罢不能”。<sup>①</sup>黄宗智认为,“第三领域”在中国的兴起、演变及发展与“集权的简约治理”制度框架密切相关。与西方社会治理路径不同,农耕国家汲取财税资源能力有限,政治上相对早熟的传统中国虽然建立起中央集权式的“儒法合一”官僚制度,但它区别于韦伯式理想类型的现代科层官僚制度,县级以下的地区依靠多种力量共同治理,其中包括:正式化的政府官员,半正式化的乡约、地保、村长,非正式化的宗族权威、地方绅衿、显要势力等。“由乡村内生权威所构成、横亘在国家权力与民众之间的板结社会”,<sup>②</sup>既是国家意志深入基层的阻力因素,同时又是“第三领域”得以形成的有利条件。如果中国不具备“从历史延续而来、迄今未发生根本变化的基层治理的‘双轨体系’”<sup>③</sup>传统,仅依赖于国家政治权力对基层社会的垂直化管理与均质化改造,那么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的“第三领域”根本就不会产生。“第三领域”的形成还得益于传统中国所追求的“儒家简约治理”理念。以相对“简约”为价值导向的基层治理理念要求“政府机构保持最少数量的科层,以免切断整个体系系倚为纽带的个人忠诚”,(第97页)造成了传统中国相对较低的基层渗透能力,在基层社会中广泛存在的“非国家空间”<sup>④</sup>为“第三领域”的形成奠定重要基础。

与西方基于利益、兴趣等因素结合的政党组织有别,中国共产党“既非纯正式官员,也非纯社会民众,而是一个试图有机地综合两者”(第382页)的具有中国特色政党。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重要资产国有化、土地产权集体化、手工行业合作化等一系列举措,建立国家治理体系。“社会的国家化”压缩了“第三领域”的空间范围与活动边界,“乡镇级的简约的乡保转化为正式的乡镇政府机构”(第226页)是这一变化的具体表现。这些举措的正向效果是新中国工业经济稳步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但“国家对社会—经济的过分管控”(第206页)仍然使非正式的社会/地方部分地丧失了发展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停滞是制度老化、制度毁灭的前兆”,<sup>⑤</sup>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体现在自我完善与自我革命的品质之中。

<sup>①</sup> 赵汀阳:《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页。

<sup>②</sup> 陈军亚:《超越内卷:“板结社会”与国家渗透》,《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

<sup>③</sup> 陈军亚:《理解基层:治理属性与改革逻辑》,《理论与改革》2023年第5期。

<sup>④</sup> 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52页。

<sup>⑤</sup>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以兼顾秩序与活力为取向的社会整合模式”，<sup>①</sup>不仅保证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变形、不走样、不偏航，而且激发起人民群众主动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意愿，重新恢复了“第三领域”与非正式体系的运行活力。黄宗智援引周黎安所提出的“行政发包制”与“官场+市场”两种理论，论析行政体系内部的“发包—承包”关系、正式化体系与外部社会的“外包”关系以及国家与市场的互塑互构关系。从“行政发包制”的实践来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的关系并不等同于西方现代“科层制当中委托人的决策权与代理人的忠实执行”<sup>②</sup>的关系，中央自上而下的“统筹谋划”与地方因地制宜的“自由裁量”的和谐共存，表明央地关系杂糅了正式、半正式与非正式的因素。承包中央政府委托的地方行政官员，往往会受到“政治锦标赛”<sup>③</sup>的激励，“向新兴且占比越来越大的民营企业伸出‘帮助的手’”，（第208页）在与企业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共同推动地方经济增长。从“官场+市场”的理论来看，无论是古典和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强调的“市场决定一切”的思想，还是计划经济体系下“政府包办全部”的观点，均犯了共同的错误，即割裂地发挥“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在配置资源方面的效能，“完全没有照顾到中国转型和改革中通过政府和民企、国家和市场的协作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实际”，（第210页）忽视了国家与社会互动合一的实践向度。

在“第三领域”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反面后果。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出于“政绩”的现实需要，有些地方官员可能会选择与不良企业“共谋”利益。由企业出资为地方修建“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等虚假地标来应对上级的考核，地方官员则默许承包工程的企业获得在其他“项目”上的优势地位，以此来实现资源互换。第二，介于正式的法庭判决与非正式的民间调解之间的“第三领域”调解“容易成为威权化的命令型纠纷处理”，（第229页）失去以互相谅解与达成共识为目标的调解实质。第三，国家与社会权力的不对等导致“第三领域”缺乏一定的自主性。如果国家规划的顶层设计不符合社会层面的实际需要，“第三领域”难免会遭遇实践的悖论与张力。“第三领域”机构必须在完成国家设定的目标任务和综合考虑基层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两个方面做好统筹与平衡。只有微妙地平衡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更好地发挥“第三领域”传统资源的作用。

现代中国的治理理念与西方的治理思路呈现出判然不同的思维方式，既对立又统一的中国宇宙观与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西方世界观塑造出不同的现代化治理路径，

<sup>①</sup> 贾双跃：《政党整合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耦合发展逻辑——以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党整合模式变迁为中心的考察》，《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6期。

<sup>②</sup> 黄宗智、周黎安：《黄宗智对话周黎安：实践社会科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236页。

<sup>③</sup> 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格致出版社2017年版，第162页。

中华文明的现代治理结构亟须在不断汲取“第三领域”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逐渐完善与定型。黄宗智认为，“形成一个既具有中国特色也是‘现代化’的‘中度国家集权’+‘较高度渗透社会’的第三领域的现代中国式政法体系”，（第231页）是一种可能的现代治理前瞻愿景。构建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现代化治理体系，既不能简单地移植西方现代化治理体系中的法治与问责制政府的形式，又不能完全遵循历史惯性进而延续传统的范式，而是必须提出兼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与现代性普遍意义的治理方案。

### 三、走向“二元合一”：政党—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学术愿景

中国社会的“二元合一”的当代实践始终是黄宗智教授进行学术研究与理论探索的“问题域”。推动他形成“问题意识”的初衷不仅有现实因素的考量，而且与其自身所坚持的人文情怀密不可分。在他看来，“感情的驱动，区别于纯粹的思考，也许更强有力、更可能成为个人成长的激励”，<sup>①</sup>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社会稳定有序的期许、国家繁荣富强的希冀等情感动力支撑着黄宗智教授进一步反思、追问中国“二元合一”的创新之路何以可能的问题。新时代中国面临“古今中西”现实长期并存、拉锯与磨合的复杂局面，如何看待、分析与纾解其内在的结构性张力是贯穿本书的中心线索，也是黄宗智教授的学术旨趣所在。

第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下，黄宗智教授借鉴恰亚诺夫的小农经济实质主义理论，汲取“东亚模式”农合作社的历史经验，构建了政党—国家与社区型农业合作社协调互动的“纵向一体化”体系。人多地少的资源现实、历史悠久的家户传统决定了新时代中国不能一味地效仿美国的“大型农场”模式，而是必须基于本国国情探索新的农民合作化模式。<sup>②</sup>恰亚诺夫认为，具有发展韧性的家户小农所形成的“小规模小农农场能够对抗农业中的大规模资本主义企业”。<sup>③</sup>适度“组织起来”的小农户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主体，“通过横向联合和纵向整合，形成合作组织体系”，<sup>④</sup>有助于集中力量抵御外部风险挑战。一方面，以村庄社区为基础的“农民合作社”为小农社员提供低息全额的信用贷款、物美价廉的生产资料、初级农产品的加工、分类、包装、储藏与销售等服务；另一方面，由政党—国家建设公益的大型批发

① 黄宗智：《实践社会科学研究指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14页。

② 徐勇：《国家化、农民性与乡村整合》，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3—44页。

③ 扬·杜威·范德普勒格：《小农与农业的艺术：恰亚诺夫主义宣言》，潘璐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44页。

④ 陈高威、温铁军：《破局乡村振兴：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11个思考》，重庆出版社2023年版，第94页。

市场与现代的交通基础设施，打通了“从田间到餐桌的整个物流链条”。<sup>①</sup>

第二，立足新发展格局，以新发展理念为价值导向，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搭建“政党—国家—社会”多维联动的高质量发展平台，实现经济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螺旋式跃迁。适应数智时代的来临，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增强科技创新发展动能，提升“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影响力。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有利于向资源短缺、基础设施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友好地输出国内相对过剩的产能与建设工程，而且有利于推动中国人民与其他国家人民形成平等互利的贸易往来共同体、开放包容的文明交融共同体与守望相助的责任共担共同体。

第三，发扬中国共产党自我革新、开拓进取与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与工作作风，通过赋能人民群众、赋权地方政府，破除理性化官僚体系运行过程中形成的壁垒，推动发展“‘参与式社会主义’的中国式民主模式”，<sup>②</sup>释放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创新能量。面对从中央到地方、从地方到基层的各种指令、指标，各级干部或者忙于应对“逐层加码”的任务，或者疲于整理“留痕”材料，深陷“加码而实质不变的形式化内卷”<sup>③</sup>的系统之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致力于解决官僚主义的弊病，领导人民走出内聚中华文明崇高道德理念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以自我革命的精神转变党内作风、以积极向上的态度代替故步自封的消极思维、以求真务实的调研解除文山会海的束缚，充分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与创新意识并由此积极投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实践中。

(责任编辑：刘君)

<sup>①</sup> 黄宗智：《中国的新型小农经济：实践与理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86页。

<sup>②</sup> 黄宗智：《“参与式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文化纵横》2023年第1期。

<sup>③</sup> 黄宗智、周黎安：《黄宗智对话周黎安：实践社会科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543页。